



2012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主 编 彭少健

副主编 王天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主 编 彭少健

副主编 王天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 彭少健主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078-3431-4

I. ①2… II. ①彭…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3627号

2012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主 编	彭少健
责任编辑	赵 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 年 4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31-4 / G · 1384
定 价	58.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第四届（2012）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

导 言

彭少健 浙江传媒学院院长、媒介素养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天德 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日子如白驹过隙,《2010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出版后,不经意间又过了两年。这两年从事媒介素养研究、推广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各自都有自己的耕耘和收获,自己的成功和喜悦。今天我们又一次将这些耕耘、收获、成功、喜悦汇集在一起,形成这本《2012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供大家阅读和参考。在《2012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出版之际,恰逢第四届 2012 西湖媒介素养高峰论坛召开,本书将作为作者的书面材料参与大会学术交流,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这两年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复旦大学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已结题,并编辑出版;浙江传媒学院彭少健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点社科规划课题《媒介素养研究》,也已顺利结题;这两个课题连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近两年发布的 20 余个课题,对当代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和推广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中国传媒大学整合了媒介素养研究力量,为深入开展研究奠定了人才力量;广东省中山市政府领导下的媒介素养师资培训,在该市教师进修学院的组织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成为我国第一个有计划、上规模的媒介素养培训机构;甘肃省康县时任县委书记王均的《西部媒介素养推广研究——以康县为例》课题,也正在有组织地进行,力争把康县打造成我国西部媒介素养教育第一县;浙江省在浙江传媒学院媒介素养研究所的推动和牵头下,联合若干新闻出版机构和中小学成立了“浙江省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会”,成为全国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省级媒介素养研究学术性社团组织;渤海大学的大学生媒介素养宣讲团,浙江传媒学院的媒介素养支教团仍循着自己的惯例开展着各自的工作……这些都是我国媒介素养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朵朵浪花,正是这些浪花催生着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大潮的兴起。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信息越来越被社会和广大公众所关注,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一起已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视野中。李月莲、王天德的《培养 21 世纪本领:浙江省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实践》的文章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他们认为,21 世纪是一个飞跃发展的年代,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尤其迅速,传播科技出现革命性的创新发展,最重要的是计算机科技和传媒科技的汇流,这个变迁被称为“传媒信息革命”(infomedia revolution)。世界自此便由单向传播模式的“第一阶段媒体时代”,进入双向传播模式的“第二阶段媒体时代”(Poster, 1995),而媒介素养的概念,也认为有需要伸延,当前国外已有学者提出“传媒信息素养”(infomedia literacy)的新概念(Lee, 1999)。他们认为,在过去十年,互联网科技的突飞猛进和 Web 2.0 的应用催生了各式各样的自主媒体(we media),包括博客、维基百科、YouTube、Facebook、Twitter、微博、公民新闻网站及其他社交网站,让“使用者生产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进入传播主流,颠覆了社会的传播权力结构。以往只有专业的传媒工作者才可以制作媒体内容,现时“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播客”,普通大众都拥有传播权,但究竟他们是否懂得运用这种新的权力,引起社会关注,

认为大众的确需要接受新的媒介素养训练。而 Web 2.0 的互联网应用、手机的流行及各类新媒体的出现,令信息科技及传播科技进一步整合,令“素养”的定义一再伸延。在新世纪,很多人提出各种适应新时代的“素养”,在众多素养中,最受重视的是“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信息和传播科技素养”(ICT Literacy)。由于信息科技和传播科技的紧密结合,这些素养的界限也打破了。过去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UNESCO)积极提倡把“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融合,再加入信息和传播科技技巧(ICT skill),组成“媒介及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新概念(Moeller, Joseph, Lau, Carbo, 20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认为,在 21 世纪每个人均必须具备“媒介及信息素养”,因为在新世纪,世界各国都从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民众的“媒介及信息素养”程度低,会妨碍这个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进度。在知识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接收、生产及传递信息和知识至为重要,培养具备“媒介及信息素养”的公民,是每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否则人力资源及国家发展均追不上时代步伐。“媒介及信息素养”是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结合。媒介素养方面,加拿大的传媒教育专家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一个人能够具批判性地了解传媒讯息及其制作的性质、技巧及影响(Media Literacy Week, 2010)。英国的传播规管机构则指出媒介素养是寻索、理解及制作传播讯息的能力(Ofcom, 2010)。美国人则认为媒介素养包含了一系列传播技能,包括在各项媒体上寻索、分析、评估和沟通的能力(NAMLE, 2010)。而香港的传媒教育倡议者则认为一个具备媒介素养的人,应有以下的能力:警觉传媒的影响、了解传媒的运作、传媒分析技巧、评赏能力、透过传媒学习、创意表达、监管及影响传媒、实践传媒道德和应用传媒讯息(Lee, 2010)。信息素养方面,信息科技专家指出,它是指从不同信息源获取、评估和使用信息的能力(Elmberg, 2006)。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信息素养指针文件,就列举了五项信息素养的内涵:认知信息需要、寻找及评估信息质量、储存及提取信息、有效及道德地使用信息、应用信息去制造知识及进行沟通(Catts & Lau, 2008)。他们的论文尝试将两种素养的内容整合,提出在 21 世纪,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应具备的一系列能力:

1. 有效及快捷地寻找有用的媒体讯息及信息。
2. 了解媒体(例如人民日报、CNN)及信息公司(例如 Google、百度、维基百科)的性质、功能及运作。
3. 了解不同媒体(例如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对同一事件,会呈现不同的现实。
4. 警觉媒体及信息对个人及社会有具大影响力。
5. 具批判力地分析及评价媒体及信息内容。
6. 懂得如何选取、组织及综合媒体讯息及信息。
7. 有效及安全地利用各种传播途径(例如电话、博客、社交网站)和其他人沟通及分享信息。
8. 合乎道德地使用媒体及信息。
9. 用美学眼光欣赏媒体及信息。
10. 透过媒体学习及了解世界。
11. 将个人从媒体得来的信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12. 具创意地制作多媒体作品。
13. 懂得监察媒体及促进改革。

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在公民的各个层面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和主题。张志俭在认真研究后,认为下列这些内容可以涵盖媒介素养教育的最

新主题：

一是媒体教育和公民教育。近期媒体教育学对公民技能培养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Kubey (2005) 强调当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媒体化，那无疑需要媒体教育来帮助人们了解惯用的游说和宣传手段。像瑞典 (Reichenbach, 1999) 和斯洛文尼亚 (Strajn, 1999) 等国家已经开始引入媒体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来帮助学生理解媒体信息。媒体教育能使学生们具有区分事实和观点，以批判性的态度去观察和阅读并从他们获得的资讯里分辨真相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能增强青少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像更能吸引并启发他们去讨论、学习和探究社会生活中的不同议题。(Buckingham 2000; Kubey, 2004)。这使他们能够通晓有关国家政策、时事以及地区和国际的新闻，而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反过来又能促使青少年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媒体教育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其促进公民参与性的能力。它让人们能够作为积极的公民参与并且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影响他们的议题 (Hobbs, 1998; Messaris, 1998)。对任何以民主政治为傲的国家来说，公共参与对讨论和建构公共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们关心政治和社会管理，表达他们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并参加投票就意味着这个民主社会充满活力并平稳运转。在过去的十年里，媒体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在 1999 年，一项覆盖 24 个国家的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揭示出“大众传媒”和“媒体教育”的词汇几乎出现在所有公民教育的案例中 (Torney-Purta, Schwillie, Amadeo, 1999)。媒体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在保加利亚 (Balkansky et al., 1999)，立陶宛 (Zaleskiene, 1999) 和哥伦比亚 (Rueda, 1999) 等国家已经广受承认。在罗马尼亚 (Bunescu et al., 1999) 和荷兰 (Dekker, 1999)，媒体教育通常作为公民教育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出现，或者像在比利时等国，在其他与公民教育高度相关的科目，如语言、历史和社会研究中讨论到 (Blondin & Schillings, 1999)。Ahonen & Verta (1990) 认为，“在资讯社会中，公民的行动和批判性思维与沟通技能和影响他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媒体教育应该被视为公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Ahonen & Verta, 1990, p248)。学者们广泛相信，在公民教育和社会研究的课堂中进行媒体教育能显著提升公民参与的程度并能促使更多的青少年定期阅读报纸。这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是媒体教育和公共健康。媒体教育近来对公众健康意识的贡献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从 1992 年开始，随着药物滥用、过早性行为、青春期妊娠、吸烟、喝酒以及艾滋病和校园暴力等问题的出现，美国媒体教育的侧重点已逐渐转到对健康资讯的解读和分析上。这是美国媒体教育的主要特色。媒介素养教育的技巧日益被许多旨在提升青少年健康意识和防止药物滥用的项目所使用。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还可以应用于解决冲突和减少侵犯行为和暴力的课程中 (Kubey, 2005)。媒体教育能够降低学生对酒精和烟草广告接受性。而在健康和科学的课堂上运用媒体教育还能帮助学生区分媒体虚构的内容和医学事实。儿童们甚至能学会分辨长时间打游戏机所出现的症状，例如眼睛疲劳、轻度头痛、恶心等。人们如何认识和处理健康问题往往是由电视、广播和报纸的报道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关于公共健康政策的重要议题都是由媒体曝光后才被察觉到的。Wallack 等人 (1993) 强调了媒体倡导的概念是预防公共健康问题的核心策略，并指出媒体倡导还能使民众获得话语权。

三是媒体教育和消费文化。媒体教育还能使学生了解消费媒体 (consumer-media) 如何制造意义和认同。消费媒体文化是一种“教学机器” (pedagogical machine) (Sholle and Denski 1995, p21)，而消费媒体教育则能帮助学生揭开它的面具，一窥其运行机制。随着市场日渐侵入到儿童的生活中，教会他们理解媒体中的不断出现的企业信息就显得至关重要。在今时今日，具有媒体素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众所周知，现在孩子们购买产品的同时也购买了它们的形象，而这些品牌也融入了青少年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当青少年将

消费文化作为建构自我认同的素材的时候，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被消费媒体文化所利用。既然不管是来自政府、企业或是其他组织和个人的信息都是由人所创造的，而这些人决定着传递的内容和方式，学生们就会明白所有的信息都受那些创造它们的人的主观性和偏见以及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的社会背景的影响（Kellner & Share, 2007, p12）。因此，批判性的媒介素养能力已经能够令学生懂得如何去挑战媒体将信息包装成不存在问题的、无隐瞒的能力。张志俭指出，当学生能够成为理性的消费者和媒体信息的制造者，亚洲的媒体教育应该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不仅仅是一种提醒学生大众媒体负面影响的工具；它能够且应该使学生变得更具分析性、参与性，更有学习的热情”。他的论述强调了媒体教育所具有的赋权性的概念。一开始媒体教育旨在防止电影的有害影响，但公民教育和大众传媒教育则侧重于媒体信息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公民和健康等方面的应用并促使人们重视有效、明智地应用媒体的意义。这项任务是任重道远的。它能为未来培养新一代的学生，对所有教师来说都相当复杂且具有挑战性。

《人民日报》2011年6月1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指出舆情不是“敌情”，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评论员文章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就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文章提醒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对待媒体的态度就是对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莫红娟在分析了网络具有的开放、互动、平等特点后，认为这些特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对党的执政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党的执政方式产生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1）党的舆论影响力受到挑战。网络信息时代有效消除了信息传播中的地理、经济、政治因素等障碍，让民众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捷、便利和互动。网民们自发的言论和意见，整合为强大的网络舆论，容易造成引发、扩散社会舆论的强烈影响。从传媒体制上看，党政机关对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尚能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控信息，而互联网络无中心、离散结构的特点，打破了信息流动方向和权力指向相一致的传播秩序，给党和政府的舆论引导造成极大的困难。如果采用强制手段直接加以控制，不仅违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而且极易招致公众的抵触和反感。（2）党的执政民主形式受到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民众对政治民主的渴求也越强烈。网络为民众提供了自由、及时、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可以对政府官员、社会事件发表意见建议、议政问政、建言献策，各种利益群体借助互联网表达诉求，形成民间舆论的强大磁场，影响并改变着事件的发展走向，如“郭美美事件”、“7·23动车事故发布”、“故宫十重门”等案例，网络民主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走进公众的政治生活，客观上也加快了党的民主执政的进程。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的充分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相互激荡碰撞，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问政如不加约束和引导，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3）党群关系的稳定受到挑战。网络信息时代改变了党群关系所处的环境。一方面，信息化的发展增加了政治透明度，使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国家社会事务，更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为民众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广泛途径，方便民众更多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有助于融洽党群关系。但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容易被激化，而且民众的民主素养和自律能力仍待加强，如果党政干部不能及时适应民众参与、监督，就极易引发党群矛盾，甚至在短时间内导致党群关系的恶化。同时，由于网络渠道存在大量真伪难辨的信息，“网络水军”等非法网络公关机构通过话题炒作制造虚假网络民意，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也影响着党群关系的发展。杜刚在《论新媒体环境下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对执政的影响》中也认为：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即时性、公开性、多元化，全面考验领导干部

的媒介素养水平和媒体公关能力，给信息化条件下党政干部执政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1) 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影响党的舆论引导能力；党对网络信息化条件下舆论工作的宏观管理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要件。领导干部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呼应广大网民的诉求，进一步提升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全面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增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权威性，通过重点新闻网站，加强正面宣传，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传播力、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提高危机干预能力，建立预警机制和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制度，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要保持清醒头脑，按照准确、及时、透明的原则，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抢占舆论引导的制高点。要加强对网络的建设和管理，积极探索网络传播规律，充分利用滚动发布、在线访谈、网络评论、即时通讯、手机短信等手段方式，熟练运用网言网语，澄清事实、解疑释惑，牢牢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在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发挥主阵地和主力军的作用。(2) 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影响民主执政的水平；领导者媒介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水平。新媒体时代，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影响政府决策方式和政治沟通方式。新媒介广泛应用，使民众意见和草根利益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社会大众可以通过网络微博、领导在线访谈、网络发帖等方式直接表达利益诉求，引发全社会关注。(3) 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影响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党若要保持其执政合法性，首要的工作就是说服民意接受其执政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公众中形成“一致”的舆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推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从这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媒介的诸项维度看，都在现实和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内形成了错综复杂而又互为冲撞的复合交错系统。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集体状态、个体状态以及体制内和体制外状态这一“多元模型”的过程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在可以预测的三五十年内不可能得以稳定和成型。因此，在处于变动状态下的信息传播过程、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内容，都对受众产生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上忽下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最大难处是受众难以接受稳定的信息、客观的信息和多元的信息。受众接收到的信息一部分是未经过社会筛选的，对社会带有危害的信息。客观的、科学的、中性的信息虽然会越来越多，但上述情况则不可忽视，会对受众带来难以琢磨的、不确定性的高危影响。公民的媒介素养普及作为现代社会发展推动力量的重要环节之一，本身也浸润着现代性扩散和聚合的逻辑，在扩散和聚合的过程中把效应推到极致。现代性的聚合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手段、思维方式、交往模式以及意义生成的急剧转变，在媒介素养语境中，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聚焦于媒介素养的构造方式和普及程度上，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聚合和展现出来。现代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推动力量在媒介素养提升层次的时空中得以迅速扩散，使原属特定人群掌握的媒介知识以及对媒介的辨析能力迅速扩散到更大的人群和更多的人数。媒介素养的要求使得每个人群和个人原本就对媒体充满“神秘”的感觉愈加要求破解，愈加要求探入其中，愈加使得他们无法拒绝媒体对他的“诱惑”。现代性的要求在这里得到充分地注释，使普及媒介知识大潮风起云涌，不断塑造和改变媒介素养知识掌握者、参与者的认知图谱。这样媒介现代性作为公民共同的代码、背景、主题和价值的意义被塑造出来，成为现代性聚合的语境前提。现代性的信息聚合，光靠我们破解，探寻媒体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公民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把社会上的信息聚合起来，让公民能自有的选择、使用，并在选择使用的过程中展示出自己的媒介素养，才能为自己的工作、生活服务。

探究新媒介成为意识形态较量重要平台的缘由，培养能辨清新媒介信息背后的价值观和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新媒介素养。新媒介是思想文化交汇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平台。新媒介信息背后很明显存在着“代表谁说话”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朱乐丰认为，西

方新媒体“最核心的价值体系就是自由主义，就是个人权利，就是民主”。这跟西方媒体的价值体系离不开他的政治意识形态，离不开他的社会文化哲学体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的一切媒体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问题。两者不但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一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新媒介时代，特别是在全民微博的时代，在声音多元、舆情复杂的今天，在西方敌对势力围绕意识形态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今天，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新媒体管控日益趋难的今天，每种新媒体信息背后的价值观和隐藏的意识形态，有时容易让身心处于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难以自我把握，因此，提高青少年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迫在眼前。这样使青少年在参与新媒介活动中，学会辨析新媒介、评价新媒介、选择新媒介，并且以青少年自身的新媒介素养的集合力量，反过来影响新媒介和改造新媒介，清理新媒介传播环境、净化新媒介传播空气，使新媒介传播无论是机构的、群体的、还是单个人的行为，都置于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平新媒介素养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和谐的传播过程之中。他还认为，新媒介素养对青少年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命题”，本质上是一个“4亿青少年今后的文化取舍、主流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问题，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新的媒介环境下，舆论产生的媒介环境与政府舆论管理模式变化，它们关系由单一到多元，由单调到灵活，由单向到互动，这些都是对政府舆论管理的一次全面挑战。张恒在《论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的舆论管理》中认为：新兴媒体产生的舆论对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力，认为互联网拥有庞大的用户是其成为民意表达平台的社会基础，同时网络空间的出现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而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的社会力量，是实现社会控制、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对舆论的把握能力是新时期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政府应加强对舆论的控制能力与引导能力。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对媒体舆论的管理既要进行适当控制，又要进行积极引导，政府只有刚柔相济，巧妙地把握住两者间的“度”。

“自由”一词的本意与“限制”相对，即由己做主。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自由”概念已经广泛蔓延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着各自领域的专业内涵，但无一不是建基于“自由为人之本性”这一哲学依据之上。冯恩大认为，“自由”是可以被任何人切身体验到的人文价值。从前由于时间、地域和金钱等因素的限制，人们选择信息和活动的自由是有限的，有了互联网这个超越国界、超越时间的空间，人们可以访问世界各地的信息，从事各种超越时空的活动。网络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具体的活动自由，而且增强了人类争取自由的能力。她认为，人们使用互联网的这种“自主性”与在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受限性”截然不同。那些长期使用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或发表个人观点的网民，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对比强烈的直接体验中，有可能渐渐获得对公民主体身份的醒悟，从而有助于自我对公民主体身份的自觉。

“开放”的反义词是“封闭”。由于我国的基本国策经历了先是“闭关锁国”后是“对外开放”的历史变化，“开放”一词令人耳熟能详。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及互联网精神的生长，本身就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直接成果。冯恩大在研究他人成果后认为，网络信息的开放，使作为公民概念对应的国家概念越来越具体可感。由于网民面对的是四通八达的全方位开放的信息传输通路，其中流通传播的政治信息巨量化且多元化，它不但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来自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信息，还提供了来自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信息，网民可以从中方便地获知公民的各种权利与义务，获知国家共同体内外的各种政治观念，不再

封闭于现实政治意识的狭小范围。而网络用户的开放，更是使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成为可能。由于每个网民都是网络使用者、信息发布者和信息传播者，每个网民都平等地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可以方便地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以行使公民的权利，同时言责自负的事后追惩也让网民意识到公民应当负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义务。这种对公民权利义务的感知体认，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步入现代化的起点。

在分析个人和社会关系时，冯恩大认为，促进共享的手段把跨越时空的网民进行了重新组织，构造了无数个公共空间，如网络论坛、即时通讯、博客、微博、兴趣群、话题圈，等等。特别是网络信息共享的机制，突破了政府的信息垄断，保障了网民之间的信息流通，生成了没有国家权力干预的网上“民间社会”，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和场域。这个虚拟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是公共话题的信息共享，其维护与发展也有赖于网民持续不断的信息发布。这就要求网民不断地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视界，关心公共利益，参与公共活动。网民活跃在公共空间，在共享精神的导引下，以公共关怀为诉求、以公共参与为目标、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公共精神由此孕育和成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也从这里开始起步。

孙勃弘在《媒介素养·网络生存·理性提升——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媒介素养教育重心的思考》中认为，现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相关知识技能与基本公共伦理规范认知、认同的教育；其核心内容则是人的理性的提升，也就是通过教育与大量的社会实践，传播体现现代文明与人伦关系的先进文化，逐步取代传统社会落后文化中的那些丛林规则、非理性行为。同时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注重务实性、针对性、体现本土性。这就是说：既要考虑教育所面对的特定对象，也要考虑教育所展开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环境；既要进行相应知识技能的传授，更要注重媒介使用者的公共伦理素质的养成和公共理性的提升。

于柯在《新时期正面人物报道初探——从受众心理视角出发？》中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后正面人物报道的内容、过程和效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报道逐渐遍及各个领域，并且具有多元化标准，道德、政治、经济、法律和职业标准都可以成为衡量正面人物的标准；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重点关注新型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精神。分析还认为，正面人物报道的这些变化和发展都与公众人格的变化和发展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公众人格的发展推动了正面人物报道的改革，而正面人物报道的创新实践也塑造着公众的现代性人格。分析认为，公众的现代性人格也就是理性人格逐渐形成。理性人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的主体性增强，反应在社会意识方面就是平民意识增强，反应在个人意识方面就是个人效能感、质疑精神增强。

关于“新闻”的内容，无论是阅读、评判或尝试写作，都不仅仅是语文教学问题，应该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视角。于翠玲在分析语文教学结合媒介素养教育时认为，教师可以选择典型的新闻文本，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很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新闻？如何认识来自新闻媒体的信息？新闻媒体是如何报道国内外大事的（如何为大众设置议程），如何反映社会生活的（对现实的建构）？对同一新闻事件，不同的媒体为什么有不同的报道角度？媒体是如何采访和编辑新闻的（分析报纸的版面、标题、语言、图片等）？网络新闻和网络舆论有什么特点（认识网络新媒体的特点）？人们对新闻的阅读和理解方式有什么不同？媒介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新闻的评判也是一种媒介批判能力，这种能力必然会提高学生新闻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国外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当进行严肃的阅读和写作活动时，媒介素养能够提升传统的文字素养能力。实证研究显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提高学校的阅读理解和分析技能。Hobbs 和 Frost（2003）使用准实验设计，对比了两组 17 岁在人口统计学上相匹配的学校，其中一个进行媒介素养的学校，发现学生在阅读理解、

理解电视新闻以及听的技巧方面有显著提高。此外,进行媒介素养的学生能够更好的辨析一个印刷新闻杂志文章、电视新闻片断和广告中的目的、受众、观点和缺失。因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了学生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也许在意义构建中超越字面和表面意思后,去探究更深层的意图和创作根源时,能够帮助发展学生的理解能力。”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培养学生对严肃新闻的认知能力,而不是低水平地满足于各种娱乐新闻,这也是在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中,学生的媒介生活体验以及对媒介的观察和认知能力对作文写作也有直接影响。赵谦祥老师倡导绿色作文,其中包括利用媒体文本作为语文课程的资源,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他开创《东方时空》感悟课,让学生从《早间新闻》、《东方之子》、《百姓故事》、《时空报道》等电视节目中,自选题材,自定角度,自拟题目,书写个人感悟。如此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积累作文素材,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关心天下大事、百姓民生的社会责任感,解决了作文写作素材积累少和阅读量不足、作文语言贫乏、思想浅薄的问题,也为媒介素养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里还要说明,教师致力于提高学生对新闻文本的解读能力,打破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实际上却有助于学生在考试中展现综合素质。

秦李在《教师媒介素养及其提升策略》中结合教师的职业特点,提出了教师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在对中山市黄圃镇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的基础上,从感知、理解媒介信息,选择、整合媒介信息,反思、传播媒介信息几个方面提出提高教师媒介素养的策略。论文认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关键在教师,教师作为传播者,其自身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到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质量。教师媒介素养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作为社会人,教师应具有基本的媒介知识与能力,以在媒介化社会中合理思辨和有效传播信息;作为专业人员,教师应该具备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力,具有较高的选择媒介、整合媒介、设计媒介的能力;作为教师这一职业,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媒介传播、多样的媒介呈现方式以及展示方法能力,以更有效地开展和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在个体与社会交互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析媒介素养的新的视角。肖国飞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媒介素养:关系及其限度》中认为,作为重要社会化场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蕴含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功能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塑造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媒介素养反过来又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演生限度,任何加强与提升二者的举措都应以其限度为空间。论文认为,从社会学的视域看,媒介素养的培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为我们解析媒介素养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通过这种范式的运用,可以深入地研究媒介素养的形成过程及成长机制以及未来图景。因此,从个体层面而言,媒介素养就是把社会环境中一定的价值、态度、技能、知识等“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习惯和准则的过程。囿于转型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及现有课程开设所需硬件与软件条件的限制,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尚存一定困难。在此情况下,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有责任承担起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有其确定的限度,由此决定了二者在演生过程中的非同步性、非协调性,同时也意味着有关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方面的任何举措都必须以二者的衍生限度为空间。

对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包含青少年和一般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介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对这些手段所产生效应的认知力和鉴别判断力,即使人们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反映现实,也知晓如何传播媒介信

息和制作传媒作品。陈海华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纸质报刊传媒人媒介素养建构的实施路径》中认为,想要提升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尤其针对纸质报刊传媒人的媒介素养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对非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外,还包括:第一,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业务方面的学习,提高在纷杂环境下的信息鉴别能力,换句话说要提升媒介从业人员的信息编码素养;第二,应该加强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受众研究方面的学习,当好合格的受众才能当好合格的传播者,反之亦然;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自身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方面的提升,态度决定一切。结合“艾滋女事件”中网络推手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提升媒介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应该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1)理念层面:学会换位思考——融合传媒人;(2)专业层面——切实提高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3)伦理层面:切实加强职业伦理和道德水平;(4)管理层面:加大对纸质报刊媒体的监督;(5)思想层面:媒介自律,坚守社会责任,守住新闻报道的底线;(6)制度层面:职能部门要建立引导媒体良性发展的机制;(7)社会层面:创造良性互动,实现媒体、社会、公众三者协同发展。

臧海群在《用公共政策筑起青少年与网络之间的防火墙》中认为,一方面是针对互联网本身,要加强网络管理的立法和规范;另一方面,是针对网络使用者——青少年群体,要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前者,党政部门基本形成共识,不断出台相应公共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对后者,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目前还缺乏各级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支持,急需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一方面是针对互联网本身,要加强网络管理的立法和规范;另一方面,是针对网络使用者——青少年群体,要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前者,党政部门基本形成共识,不断出台相应公共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对后者,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目前还缺乏各级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支持,急需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我国青少年虽然长期接触网络,但对网络仍缺乏足够理性的认识和行为约束。刘宣文、沈莉在《多方合力,培养青少年网络识读能力》中认为,网络识读教育着眼于青少年的终身发展,渗透了“超越保护主义”观念,强调了网络的积极功能和对青少年“赋权”,主要目的是提高青少年对网络的认知水平和运用能力,帮助青少年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具备现代社会的生存能力,参与社会发展。网络识读能力是指网络受众能够运用网络知识,以批判的态度对网络信息进行近用、分析、评价和应用的能力。具体包括:了解网络知识;会使用网络的基本功能;能合理地管理网络使用行为;能辩证地看待网络的影响;能辨识网络信息的真伪和不良信息;能区别网络真实与社会现实的差异;具备网络安全、网络法律和网络道德意识,遵守网络礼仪;能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创作和传播。

当前我国青少年女性借助网络生成一定的“网络媒介化生活”样态,形成新型社会化路径宋红岩在《网络发展对青少年女性社会化的影响研究》中认为,网络对青少年女性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审美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教化作用。同时,网络弱控制性、社会环境虚拟性、个体娱乐宣泄性等特质,又消解青少年女性的话语权、性别定位以及社会化发展进程。加强青少年女性网络媒介素养教育、青少年女性网络人文价值软环境的营造、青少年女性社会化氛围的构建来提升与优化青少年女性社会化网络环境的研究。

马兆峰在《大学生DV短片创作与媒介素养培育》中以大学生DV短片创作为关注重点,对大学生DV创作群体媒介素养与人文素质的缺乏进行反思,探讨媒介素养培育的思路和方法,以期推动大学生DV影像创作与传播的健康发展。数字短片创作的形式特性能够展现现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思维特征,大学生作为校园DV短片创作的主体,所传播和传递内容应该体现主流的人文素养与价值观。DV影像有自己的媒介特征,媒介信息传播的质量好坏及社会影响决定了大学生创作群体需要良好的媒介素养、人文素养与社会责任。DV短片的表现语言、媒介特性与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发展特征对是否应重视大学生媒介

素养教育带来启示颇多。大学生DV创作群体在短片创意制作过程中确实应该具有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与制作能力。而媒介素养教育也应当得到高等教育特别是传媒类高校的重视,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充分发挥DV影像媒介信息传播优势,培养大学生DV创作群体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与影视媒介创作的能力。

廖峰在《媒介素养与网络传播“把关人”的颠覆与超越》中结合网络传播的特征,从主体、过程、模式等角度剖析传统“把关人”角色的颠覆趋势,分析普通网民在信息接收、解读、发布等层面对传统“把关人”角色的超越进程。从而进一步提出公众媒介素养对于更好地进行传播把关,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网络技术的普及,宣告传统全知型、全能型“把关人”时代的终结和“全民把关”新世纪的到来。在这场颠覆和超越进程中,需要更多的“把关人”来维护网络安全、网络公德以及网络秩序。除了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网络服务商要加强行业自律之外,职业“把关人”要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专业水平,变监督为主向引导和监督并重转变,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把关服务。更关键的是,普通网民要树立“自我把关”的意识,不断提高媒介素养,真正体现网络传播者的把关作用,净化网络生态环境。这既是网络时代赋予普通公众的一项权利,亦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篇幅关系,其他的一些文章观点就不再评述了,敬请谅解!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皆属学术研究探讨之中的个人观点,旨在抛砖引玉,对我国媒介素养研究、教学、实践起探索、借鉴作用。本书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其他作者文章内容、观点时,若发生侵权问题,责任由本书作者自负。

在此书即将成书之际,我们特别感谢所有的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在这里还要感谢参与编辑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宋红岩、陈恩诺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祝晔老师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2012年3月于杭州

目 录

导 言	彭少健 王天德 / 1
-----------	-------------

第一报告厅 香港专家特稿

新媒体背景下的媒介教育	张志俭 / 3
培养 21 世纪本领：浙江省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与实践	李月莲 王天德 / 11

第二报告厅 公共管理与媒介素养研究

用公共政策筑起青少年与网络之间的防火墙	臧海群 / 21
论新媒体环境下党政干部媒介素养对执政的影响	杜 刚 / 22
传媒的力量	南 山 / 26
新媒介素养对青少年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和对策	朱乐丰 / 31
媒介执政：一种重要的执政方式	杜 刚 王天德 / 36
浅论网络信息时代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与执政能力建设	莫红鹄 / 39
互联网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内在关联	冯恩大 / 44
探析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文化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段 婧 / 47
网络发展对青少年女性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宋红岩 / 51
从网络新闻事件看网络媒介从业者素养构建路径	陈海华 / 56
不同类别学校学生眼中的网络道德形象分析	何 娟 秦 倩 秦学智 / 62
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服务及社交媒介素养培养	何庆平 张智华 秦学智 / 69
试论微博的舆论监督功能	
——以近期官员因微博“触礁”为例	张智华 何庆平 秦学智 / 74
青少年学生眼中手机道德形象调查	秦 倩 何 娟 秦学智 / 77
在新媒介环境下我国政府如何实现舆论管理	张 恒 / 82
媒介素养与网络传播“把关人”的颠覆与超越	廖 峰 / 90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减少电视负面影响	廖玉斌 / 94
跨文化视角解析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社会行动者网络”模式	冯 茵 / 98
“微时代”手机视频的融合与创新	周忠成 / 104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网络媒介的角色探讨	
——以汶川地震为例	张 骊 / 108
新时期正面人物报道初探	
——从受众心理视角出发	于 舸 / 115
媒介融合背景下，纸质报刊传媒人媒介素养建构的实施路径	陈海华 / 121
娱乐文化价值观在卫视行业的体制化及其对电视人职业行为的影响	梅笑冰 / 125

三方共赢还是功能异化

- 对 CCTV 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媒介事件”运作分析 石 研 / 131

第三报告厅 媒介素养教学研究

-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透视 彭少健 / 141
-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研究 王天德 / 145
- 儿童媒介识读教育实验研究
- 以小学五年级为例 刘宣文 沈 莉 / 150
- 媒介素养·网络生存·理性提升
-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媒介素养教育重心的思考 孙抱弘 / 160
-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关系及其限度
- 基于社会化的分析视角 肖国飞 / 162
-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媒介素养教育融合课的课程比较研究
- 以媒介素养教育和社会学科的融合课为例 况瑞娟 / 167
- 媒介素养教育融入中学语文教学的思路 于翠玲 / 172
- 基于杭州市夏衍中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 骆中成 / 177
- 媒介素养教育：中山市素质教育的新课题 朱 鹏 / 187
- 试论媒介素养教育对语文课堂的“六化”影响 葛映红 / 190
- 教师媒介素养及其提升策略 秦 李 / 195
- 农村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研究 何 村 景天成 左亚娟 / 199
- 小学生媒介素养环境与问题、对策研究
- 以渤海大学大学生农村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宣讲团在锦州市宝地小学、
八家子小学的媒介素养活动为例 何 村 黄 鑫 景天成 张晓平 / 208
- 普通高校新闻专业实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李 骏 洪佳士 / 214
- 大学生 DV 短片创作与媒介素养培育 马兆峰 / 218
- 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研究 高文苗 / 222
- 新媒介环境下的大学生广告素养教育研究
- 以手机和网络广告为例 李 薇 / 225
- 幼儿媒介素养游戏的设计及实效性分析 李 清 / 230
- 校园媒体在大学文化建设及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为 赵 雯 / 235
- 西部山区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研究
- 以甘肃省康县中小学生为例 张怡楠 张泽涵 陆 婷 江 珊 陈 楠 / 239

第四报告厅 新媒体媒介素养研究

- 数字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主体传播权利的再思考 闫 欢 / 247
- 亨利·詹金斯“新媒介素养”理念探析及启示 汪舒仪 / 251
- 试论 e 时代背景下新媒体的从业素养 应 坚 / 255
- 自媒体环境下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研与分析
- 基于杭州、武汉、广东的实证调查 宋红岩 魏业群 / 259
- 新媒介文化视野下农民工业余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 以手机为例 李 智 许 达 / 276

新媒体环境下对外传播人才媒介素养自身教育研究	卢 懿 / 283
大连网络电视 (IPTV) 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及思考	郑保章 李 佳 / 287
新媒体消费平台对公众消费与生活的影响	
——以淘宝网、苹果公司 iTunes Store 为例	贾斯涵 / 295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王秋兰 / 300
从灾难性事件报道看网络媒体的媒介素养	
——以日本 9.0 级强震引发核危机为例	王昕初 / 304
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意义三解	冯恩大 / 307
互联网时代媒介素养教育意义的嬗变	冯溪屏 彭毅力 / 309
多方合力, 培养青少年网络识读能力	刘宣文 沈 莉 / 312
网络文化传播的六大规律	李文明 吕福玉 陈丽丹 / 314